



史記

文白对照

(西汉)司马迁的撰
中华文化讲堂·译

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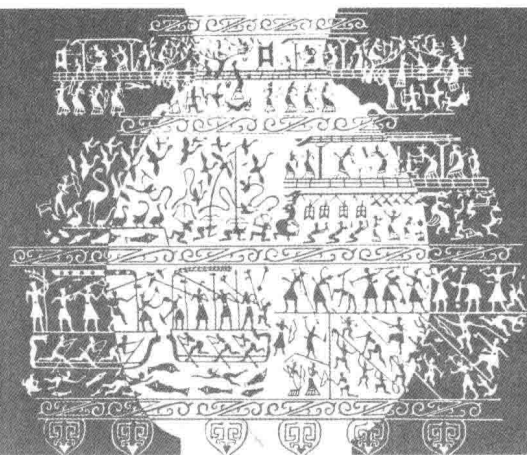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華僑出版社

文／白／对／照

史記

(西汉) 司马迁◎撰
中华文化讲堂◎译

三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伯夷列传第一

夫学者载籍极博，犹考信于六艺。《诗》《书》虽缺，然虞夏之文可知也。尧将逊位，让于虞舜，舜禹之间，岳牧咸荐，乃试之于位，典职数十年，功用既兴，然后授政。示天下重器，王者大统，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，许由不受，耻之，逃隐。及夏之时，有卞随、务光者。此何以称焉？

太史公曰：余登箕山，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，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详矣。余以所闻由、光义至高，其文辞不少概见，何哉？

孔子曰：“伯夷、叔齐，不念旧恶，怨是用希。”“求仁得仁，又何怨乎？”余悲伯夷之意，睹軼诗可异焉。其传曰：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齐，及父卒，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：“父命也。”遂逃去。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国人立其中子。于是伯夷、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，盍往归焉。及至，西伯卒，武王载木主，号为文王，东伐纣。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曰：“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谓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谓仁乎？”

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：“此义人也。”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乱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、叔齐耻之，义不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，作歌。其辞曰：“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？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！”遂饿死于首阳山。由此观之，怨邪非邪？

学者们涉猎的书籍虽然极为广博，但还是得从“六经”中查考可信的依据。

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虽然残缺不全，然而有关虞、夏史事的记载还是可以看到的。唐尧将要退位时，把帝位让给虞舜；而虞舜以及后来的夏禹，都是四方诸侯和州牧一致推荐，才试任官职管理政事几十年，待到他们建立功绩后，才把帝位传给他们。这表明，政权是最重要的宝器，帝王是政权的继续，所以传交帝位才如此地郑重审慎啊！但是，诸子杂记里却记载说，唐尧想把天下传给许由，许由不仅不接受，并以此为耻而逃走隐居起来。到了夏朝，又有卞随、务光两个人不肯接受帝位，双双投水而死。这些，又要如何说呢？

太史公说：我曾经登上箕山，那上面居然有许由的墓呢。孔子依次论列古代的仁人、圣人、贤人，如吴太伯、伯夷这些人，记载十分详尽。我所听说的许由、务光，他们的德义是极高的，但是经书里连一点大略的文字记载也见不到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孔子说：“伯夷、叔齐不记旧仇，因而很少怨言。”又说：“他们追求仁德，就得到了仁德，又为什么要怨恨呢？”我悲怜伯夷的心意，看到他们未被经书载录的遗诗，又感到很诧异。他们的传记里写道：伯夷、叔齐，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。父亲想要立叔齐为君，等到父亲死后，叔齐要把君位让给伯夷。伯夷说：“这是父亲的意愿！”于是逃走了。而叔齐也不肯继承君位逃走了。国人只好拥立孤竹君的另一个儿子。这时，正好伯夷、叔齐听说西伯姬昌敬养老人，就商量说何不去投奔他呢？可是到那里时，西伯姬昌已经死了。他的儿子武王追尊西伯姬昌为文王，并把他的木制灵牌载在兵车上，正向东进兵讨伐纣王。伯夷、叔齐拉住武王的马缰劝阻说：“父亲死了尚未安葬，就发动战争，能说得上是孝吗？作为臣子去杀害君王，能说得上是仁吗？”

武王身边的随从要杀死他们，太公姜尚说：“这是两位义士啊。”于是扶起他们，送走了。等到武王平定了殷乱以后，天下都归顺了周朝。而伯夷、叔齐却以此为耻，他们坚守大义不吃周朝的粮食，并隐居于首阳山，靠采摘野菜来充饥。待到饿得快要死的时候，作了一首歌，歌辞说：“登上首阳山，采薇来就餐，残暴代残暴，不知错无边。神农虞夏死，我欲归附难！可叹死期近，生命已衰残！”于是就这样饿死在了首阳山。从这首诗看来，伯夷、叔齐他们是怨恨呢，还是不怨呢？

或曰：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”若伯夷、叔齐，可谓善人者非邪？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！且七十子之徒，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。然回也屡空，糟糠不厌，而卒蚤夭。天之报施善人，其何如哉？盗跖日杀不辜，肝人之肉，暴戾恣睢，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，竟以寿终。是遵何德哉？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。若至近世，操行不轨，专犯忌讳，而终身逸乐，富厚累世不绝。或择地而蹈之，时然后出言，行不由径，非公正不发愤，而遇祸灾者，不可胜数也。余甚惑焉，悦所谓天道，是邪非邪？

子曰，“道不同不相为谋。”亦各从其志也。故曰：“富贵如可求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。”举世混浊，清士乃见。岂以其重若彼，其轻若此哉？

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贾子曰：“贪夫徇财，烈士徇名，夸者死权，众庶冯生。”“同明相照，同类相求。”“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伯夷、叔齐虽贤，得夫子而名益彰。颜渊虽笃学，附骥尾而行益显。岩穴之士，趣舍有时若此，类名堙灭而不称，悲夫！闾巷之人，欲砥行立名者，非附青云之士，恶能施于后世哉？

有人说：“上天待人是沒有偏私的，它总是向着好人。”那么，像伯夷、叔齐他们难道不是好人吗？他们聚积仁德，保持高洁的品行，却终致饿死！再说，在孔子的七十名得意学生里，只有颜渊被他称为好学之人，而颜渊却穷困潦倒，连粗劣之食都难得饱足，最后过早地死亡了。那些认为上天会善待好人的说法又如何呢？盗跖成天杀害无辜的人，吃人的心肝，凶横残暴，聚集了党徒几千人，横行天下，竟然长寿而终。这遵循的是什么道德呢？这都是些重大而又显著的例子啊。如果说到近世，那些不走正路、专门违法犯禁的人，却能终生安逸享乐，过着富足的生活，世世代代都保有丰厚的产业。而有些人选好了道路才举步，看准了时机才说话，从不走邪道，不是公正的事决不发愤去做。像这样小心审慎而遭祸灾的人，多得没法数。对此我深感困惑不解，如果说这便是天道，那这天道究竟合理呢，还是不合理呢？

孔子说“思想见解不一致的人，不能共同谋划事情。”也只能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。所以他说：“假如富贵是可以寻求得到的话，那么即使做个卑贱的马夫，我也愿意去干；如果寻求不到，那还是按照我所喜好的去做吧。”“岁月到了寒冷的季节，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谢的。”整个世道混乱污浊的时候，品行高洁的人才会显露出来。这难道是因为他们把道德看得太重，或将富贵看得太轻吗？

孔子说：“君子最担心的是死后名声不被传扬。”贾谊说：“贪财的人为财而丧命，重义轻生的人为名而献身；自命不凡而贪图权势的人为争权而死，平民百姓则爱惜性命而厌恶死亡。”《易经·乾卦》上说：“同样明亮的东西就会相互映照，同样种类的事物则会互相应求。”“云跟从龙而生，风伴随虎而起，圣人出现，才使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得以显露。”伯夷、叔齐虽然有贤德，不过因为孔子的赞扬而声名更为昭著。颜渊虽然专心好学，也不过只是因为追随孔子，他的德行才更加显著。那些隐居山林岩穴的隐士，或名声晓达，或湮没无闻，这些人名声淹没而不被称道，这实在是可悲的事情！那些穷乡僻壤的士人，想要磨砺德行、树立名声，如果不能依附那名望、地位极高的人，哪能扬名于后世呢？

管晏列传第二

管仲夷吾者，颍上人也。少时常与鲍叔牙游，鲍叔知其贤。管仲贫困，常欺鲍叔，鲍叔终善遇之，不以为言。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，管仲事公子纠。及小白立为桓公，公子纠死，管仲囚焉。鲍叔遂进管仲。管仲既用，任政于齐，齐桓公以霸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管仲之谋也。

管仲曰：“吾始困时，尝与鲍叔贾，分财利多自与，鲍叔不以我为贪，知我贫也。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，鲍叔不以我为愚，知时有利不利也。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，鲍叔不以我为不肖，知我不遭时也。吾尝三战三走，鲍叔不以我怯，知我有老母也。公子纠败，召忽死之，吾幽囚受辱，鲍叔不以我为无耻，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也。”

鲍叔既进管仲，以身下之。子孙世禄于齐，有封邑者十余世，常为名大夫。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。

管仲既任政相齐，以区区之齐在海滨，通货积财，富国强兵，与俗同好恶。故其称曰：“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，上服度则六亲固。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下令如流水之原，令顺民心。”故论卑而易行。俗之所欲，因而予之；俗之所否，因而去之。

其为政也，善因祸而为福，转败而为功。贵轻重，慎权衡。桓公实怒少姬，南袭蔡，管仲因而伐楚，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。桓公实北

管仲，名夷吾，是颍上人。年轻时经常和鲍叔牙交往，鲍叔牙知道他贤明、有才干。管仲家境贫困，经常占鲍叔牙的便宜，但鲍叔牙却始终待他很好，不因为这些事而介意。后来，鲍叔牙侍奉齐国公子小白，管仲侍奉公子纠。等到小白立为齐桓公的时候，公子纠被杀死，管仲被囚禁。于是鲍叔牙就向齐桓公推荐管仲。管仲被任用以后，在齐国掌管政事，齐桓公因此而称霸，并以霸主的身份，多次会盟诸侯，稳定天下，这都是采用了管仲的智谋。

管仲说：“当初我贫困时，曾经和鲍叔牙一起做买卖，分财利时自己总是多要一些，鲍叔牙并没有将我当作贪财奴，他知道我家里贫穷。我曾经替鲍叔牙谋划事情，结果反而使他更加困窘。鲍叔牙没有认为我愚笨，他知道时运有时顺利，有时不顺利。我曾经多次做官又多次被国君驱逐，鲍叔牙没有认为我无能，他知道我没遇上好时机。我曾经多次打仗却多次逃跑，鲍叔牙没有认为我胆小，他知道我家中还有老母需要赡养。公子纠争王位失败后，我的同僚召忽为之自杀殉难，我被关在深牢中忍辱苟活，鲍叔牙没有认为我不知廉耻，他知道我不会为小的过失而羞愧，却会为功名不显扬于天下而感到羞耻。生养我的是父母，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叔牙啊。”

鲍叔牙荐举了管仲之后，甘心位居管仲之下。他的子孙世代代享受齐国的俸禄，有封地的就有十几代人，多数是著名的大夫。因此，天下人更多的不是称赞管仲的贤能，而是赞美鲍叔牙善于识别人才。

管仲出任齐相执政以后，凭着小小的齐国滨临大海的地理条件，流通货物，积累财富，使得齐国国富兵强，并与百姓同好恶。所以他在《管子》一书中称述说：“粮仓充实了，百姓才懂得礼节；衣食丰足了，百姓才懂得荣辱；国君的作为合乎法度，六亲才会紧紧依附。不提倡礼义廉耻，国家就会灭亡。国家颁布政令就像流水的源头，要能顺乎民心。”所以他的政令浅显而易于推行。百姓想要得到的，就因势给予他们；百姓所反对的，就顺应他们而废除。

管仲执政的时候，善于因势利导，转祸为福，转败为功。他十分重视事情的轻重缓急，谨慎地权衡事情的利弊得失。齐桓公本来是恼恨蔡姬，因而向南袭击蔡国的，管仲就劝齐桓公趁机讨伐楚国，责备它没有向周王室进贡包茅。桓公实际上是向北征伐山戎进行扩张，而管仲却趁机让桓公督促燕国实行召公的善政。

征山戎，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。于柯之会，桓公欲背曹沫之约，管仲因而信之，诸侯由是归齐。故曰：“知与之为取，政之宝也。”

管仲富拟于公室，有三归、反坫，齐人不以为侈。管仲卒，齐国遵其政，常强于诸侯。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。

晏平仲婴者，莱之夷维人也。事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，以节俭力行重于齐。既相齐，食不重肉，妾不衣帛。其在朝，君语及之，即危言；语不及之，即危行。国有道，即顺命；无道，即衡命。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。

越石父贤，在缙绁中。晏子出，遭之涂，解左骖赎之，载归。弗谢，入闺。久之，越石父请绝。晏子愕然，摄衣冠谢曰：“婴虽不仁，免于于厄，何子求绝之速也？”石父曰：“不然。吾闻君子诘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。方吾在缙绁中，彼不知我也。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，是知己；知己而无礼，固不如在缙绁之中。”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。

晏子为齐相，出，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。其夫为相御，拥大盖，策驷马，意气扬扬甚自得也。既而归，其妻请去。夫问其故。妻曰：“晏子长不满六尺，身相齐国，名显诸侯。今者妾观其出，志念深矣，常有以自下者。今子长八尺，乃为人仆御，然子之意自以为足，妾是以求去也。”其后夫自抑损。晏子怪而问之，御以实对。晏子荐以为大夫。

太史公曰：吾读管氏《牧民》《山高》《乘马》《轻重》《九府》，及《晏子春秋》，详哉其言之也。既见其著书，欲观其行事，故次其传。至其书，世多有之，是以不论，论其轶事。

齐、鲁两国在柯地会盟时，桓公想背弃曹沫逼迫他订立的归还鲁地的盟约，管仲就顺应形势劝他信守盟约，诸侯们因此而归顺了齐国。所以他说：“懂得给予正是为了有所获取，这是治理国事的法宝。”

管仲的富足可以跟国君相比，拥有华丽的三归台和国君的宴饮设备，齐国人并不因此而认为他奢侈。管仲逝世后，齐国仍遵循他的政教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旧称霸于诸侯。此后过了一百多年，齐国又出了一个晏婴。

晏子，字平仲，名婴，是齐国莱地夷维人。他侍奉过齐灵公、齐庄公、齐景公三代国君，由于节约俭朴、亲躬理事，而受到齐国人的敬重。他做了齐国宰相后，饭桌上没有第二种肉菜，妻妾不穿丝绸衣服。在朝廷上，国君赞许他，他就谨慎自己的言语；国君没有赞许他，他就注意端正自己的行为。国君能行正道，他就顺着国君的命令去做；不能行正道时，他就权衡利害后斟酌着去办。因此，他在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三代时，名声在各诸侯国中显赫一时。

越石父是个十分贤能的人，却陷于监牢之中。晏子外出，在路上遇到他，便让人解下车驾左边的马，将他赎了出来，载着他回到府里。晏子没有向越石父告别一声，便走进了内室，过了好久没出来。越石父对晏子说要绝交。晏子大吃一惊，匆忙整理好衣帽连连道歉说：“我晏婴虽然说不上有仁德，但也总算帮助您从困境中解脱出来，为什么您这么快就要求与我绝交呢？”越石父说：“话不能这么说。我听说君子只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那里受委屈，而在知己面前意志却是自由伸展的。当我被囚禁在牢中的时候，那些人是了解我。你既然已经知道我的为人而受到感动，把我赎了出来，这就是了解我；既然了解我却未按礼节待我，那还不如让我囚禁在监牢之中。”于是晏子就请他进屋，待他为贵宾。

晏子做齐国宰相时，有一次坐车出门，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窥视丈夫。她丈夫替宰相驾车，头上遮着大伞，扬鞭驱马，神气十足，很是自我得意。不久回到家里，他的妻子就要求离婚。车夫问她离婚的原因，妻子说：“晏子身高不过六尺，却做了齐国的宰相，名声显扬于各国。今天我看他外出，见他思虑非常深远，总是态度谦和。现在你身高八尺，才不过做了人家的车夫，但看你的神态却自我满足。因此我要求和你离婚。”从此以后，车夫便自觉地控制自己，谦虚恭谨起来。晏子发现了他的变化，觉得很奇怪，就问他，车夫如实相告。晏子就推荐他做了大夫。

太史公说：我读了管仲的《牧民》、《山高》、《乘马》、《轻重》、《九府》和《晏子春秋》，这些书上说得都很详细！读了他们的著作，就想考察他们的事迹，所以就依次编写了他们的传记。至于他们的书，世上大都能见到，因此不再论述，只记载他们的一些轶事。

管仲，世所谓贤臣，然孔子小之。岂以为周道衰微，桓公既贤，而不勉之至王，乃称霸哉？语曰“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故上下能相亲也”。岂管仲之谓乎？

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，成礼然后去，岂所谓“见义不为无勇”者邪？至其谏说，犯君之颜，此所谓“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”者哉！假令晏子而在，余虽为之执鞭，所忻慕焉。

管仲是世人所说的贤臣，但孔子却小看他。难道认为是周朝的统治已经衰微，桓公既然贤明，而管仲便不勉励他实行王道却辅佐他称霸吗？有句话说：

“顺应并推广美德，匡正并补救恶行，所以君臣百姓之间能够亲密无间。”这难道不是说的管仲吗？

当初晏子伏在庄公尸体上痛哭吊他，行完臣子的礼节后才离开，这难道就是人们所说的“见义不为就没有勇气”的表现吗？至于晏子直言进谏，触犯君主的面子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在政就想到竭尽忠心，在野就想到弥补过失”的人啊！假使晏子现在还活着，即使让我替他执鞭赶车，那也是我非常高兴和向往的事啊！

老子韩非列传第三

老子者，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，姓李氏，名耳，字聃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

孔子适周，将问礼于老子。老子曰：“子所言者，其人与骨皆已朽矣，独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时则驾，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。吾闻之，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骄气与多欲，态色与淫志，是皆无益于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，若是而已。”孔子去，谓弟子曰：“鸟，吾知其能飞；鱼，吾知其能游；兽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为罔，游者可以为纶，飞者可以为矰。至于龙，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。吾今日见老子，其犹龙邪！”

老子修道德，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。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，乃遂去。至关，关令尹喜曰：“子将隐矣，强为我著书。”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终。

或曰：老莱子亦楚人也，著书十五篇，言道家之用，与孔子同时云。

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，或言二百余岁，以其修道而养寿也。

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，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：“始秦与周合，合五百岁而离，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。”或曰儋即老子，或曰非也，世莫知其然否。老子，隐君子也。

老子之子名宗，宗为魏将，封于段干。宗子注，注子宫，宫玄孙假，假仕于汉孝文帝。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，因家于齐焉。

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，儒学亦绌老子。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

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。姓李，名耳，字聃，在周朝做掌管藏书室的史官。

孔子到周朝国都去，打算向老子请教礼的学问。老子说：“你所说的礼，倡导它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朽了，只有他的言论还在。况且君子遭遇好运时，就驾着车出去做官；不逢其时，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。我听说，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囤集起来，外表上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。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，但他的容貌却谦恭得像愚钝的人。去掉您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，抛弃您故意做作的姿态和过大不切实际的志向，这些对于您自身都是没有好处的。我能告诉您的，就这些而已。”孔子回去以后，对弟子们说：“鸟儿，我知道它能飞；鱼儿，我知道它能游；走兽，我知道它能跑。会跑的可以织网来捕获它，会游的可以使用丝线去钓住它，会飞的可以用弓箭去射击它。至于龙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它能驾着风云而飞腾升天。我今天见到了老子，他大概就像一条龙吧！”

老子研究道德学问，他的学说以深自韬隐、不求闻达为宗旨。他在周都住了很久，见周朝衰微了，于是就离开了。经过函谷关，关令尹喜对他说：“您就要隐居了，请勉力为我写本书吧。”于是老子就著述了《道德经》，分上下两篇，论述了道德的本意，共五千多字，然后离去，再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。

有的人说：老莱子也是楚国人，著书十五篇，讲述的是道家的作用，和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。

老子大概活了一百六十多岁，也有人说他活了二百多岁，是因为他能修养道德因而长寿啊。

孔子去世后一百二十九年，史书记载周太史儋会见秦献公时曾预言：“当初秦国与周朝是合在一起的，大概五百年后又分开了，而分开七十年之后，称王称霸的人就出现了。”有的人说太史儋就是老子，也有的人说不是，世上没有人知道哪种说法是对的。老子，就是一位隐居的君子。

老子的儿子叫李宗，是魏国的将军，他被分封于段干。李宗的儿子叫李注，李注的儿子叫李宫，李宫的玄孙叫李假。李假曾在汉孝文帝时做过官。而李假的儿子李解做过胶西王刘卬的太傅，因此就定居在齐地。

世上学习老子学说的人，往往贬斥儒学；信奉儒家学说的人，往往也贬斥老子的学说。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难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？老子认为，无为而

岂谓是邪？李耳无为自化，清静自正。

庄子者，蒙人也，名周。周尝为蒙漆园吏，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。其学无所不窥，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。故其著书十余万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作《渔父》《盗跖》《胠箧》，以诋訾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术。畏累虚、亢桑子之属，皆空语无事实。然善属书离辞，指事类情，用剽剥儒、墨，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。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，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。

楚威王闻庄周贤，使使厚币迎之，许以为相。庄周笑谓楚使者曰：“千金，重利；卿相，尊位也。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？养食之数岁，衣以文绣，以入大庙。当是之时，虽欲为孤豚，岂可得乎？子亟去，无污我。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，无为有国者所羁，终身不仕，以快吾志焉。”

申不害者，京人也，故郑之贱臣。学术以干韩昭侯，昭侯用为相。内修政教，外应诸侯，十五年。终申子之身，国治兵强，无侵韩者。

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。著书二篇，号曰申子。

韩非者，韩之诸公子也。喜刑名法术之学，而其归本于黄老。非为人口吃，不能道说，而善著书。与李斯俱事荀卿，斯自以为不如非。

非见韩之削弱，数以书谏韩王，韩王不能用。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，执势以御其臣下，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，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。以为儒者用文乱法，而侠者以武犯禁。宽则宠名誉之人，急则用介胄之士。今者所养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养。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，观往者得失之变，故作《孤愤》《五蠹》《内外储》《说林》《说难》十余万言。

然韩非知说之难，为《说难》书甚具，终死于秦，不能自脱。

治，听任自然的变化；清静不挠，自然能得事理之正。

庄子，是蒙地人，名字叫周。他曾做过蒙地漆园的官吏，与梁惠王、齐宣王是同一时代的人。他学识渊博，学说无所不及，但他的中心思想却源于老子的学说。他所写的十余万字的著作，大多是托词寄意的寓言。他的《渔父》《盗跖》《胠箧》，是用来诋毁孔子学派的人，而表明老子学说的。畏累虚、亢桑子之类的，都是没有实事的杜撰。但是庄子善于行文措辞，描摹事物的情状，用来攻击儒家和墨家的学说，即便是当世的博学之士，也都难免遭受到攻击。他的文章汪洋恣肆，任意发挥，所以王公大人对他也毫无办法。

楚威王听说庄周贤能，派人带着丰厚的礼物去聘请他，答应让他做卿相。庄子笑着对楚使说：“千金，的确是厚礼；卿相，的确是尊位。您难道没见过天子祭祀天地时用的牛吗？喂养它们好几年，然后给它披上带有花纹的彩色绸缎，送进太庙去作祭品。这时，它即便是想做一头自由的小猪，难道还能办得到吗？您赶快走吧，不要玷污了我的人格。我宁愿在污浊的小水沟里自由自在地游戏，也不愿被国君所约束。我终身不会做官，使自己的心志愉快。”

申不害，是京邑人，原先是郑国的小官。后来他学了刑名之术来求见韩昭侯，韩昭侯任命他为宰相。他对内整饬政教，对外应对诸侯，前后达十五年之久。一直到申不害去世之时，国治兵强，没有哪个国家敢侵犯韩国。

申不害的学说本源于黄帝和老子，而主张循名责实。他的著作有两篇，叫做《申子》。

韩非，是韩国的贵族子弟。他爱好刑名法术的学说。这种学说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黄帝和老子。韩非生来口吃，不善于讲话，却擅长于著书立说。他和李斯都是荀卿的学生，李斯自认为才能不如韩非。

韩非看到韩国国势渐渐衰弱，屡次上书规谏韩王，但韩王都没有采纳他的意见。韩非痛心当时国君治国不致力于修明法制，不能用权势来驾驭臣子，不能使国家富强、兵力强大，不求任用贤能之士，反而任用一些文学游说之士，使他们的地位高于专务功利实效的人。他认为儒生搬弄文辞扰乱了国家法度，而游侠凭借着武力干犯禁忌。国家太平时，君主就恩宠那些有浮名虚誉的文人；形势危急时，又去使用那些披甲带胄的武士。现在国家培养的人并不是国家所需要的，而所需要的人又不是平时培养的。他悲叹廉洁正直的人不被邪曲奸枉之臣所容，考察了历史上治国得失的变化，所以写了《孤愤》《五蠹》《内外储》《说林》《说难》等十余万字的著作。

然而韩非尽管深知游说之道的艰难，撰写的《说难》一文特别详备，但最终还是被害死在秦国，不能逃脱祸难。